

中国电影中的历史书写与平民英雄

■文宋宇 吴张慧瑜

2021年11月26日,《长津湖》超越《战狼2》成功“登顶”中国电影市场票房榜。《长津湖》的成功不仅是中国电影为建党百年献上的一份重大贺礼,而且象征了这一国产电影的整体基调。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中国电影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革命者》、《1921》、《我和我的父辈》等一批主旋律电影不仅再度唤醒了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中国电影市场,而且彰显出中国电影人的浪漫与爱国主义情怀。从长远的视角来看,2021年有很多国产影片正在逐渐摆脱西方电影的叙事框架,将镜头聚焦到家庭、社会和时代议题,讲述属于中国观众的情感记忆和文化认同。

主流大片中历史故事的重写

《革命者》、《1921》作为建党百年的重点献礼片,同时登陆2021暑期档。两部电影虽表现相同的历史题材,却采用了不同的讲述方式。影片《1921》通过对历史群像的刻画,表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为理想奋斗、为真理献身的精神。《革命者》则将叙述视点聚焦到李大钊身上,人物性格的刻画更加饱满。影片以李大钊被执行绞刑38小时倒计时开始,通过反复的插叙和闪回,凸显出当时混乱割据的中国社会,以及黑暗中燃烧的革命火种。

国庆档上映的《我和我的父辈》延续了之前的两部作品,仍然采用拼盘式的叙事结构,影片这次选取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四个历史坐标,通过发生在小家庭中有关父辈的故事,刻画大时代背景下飞跃巨变的中国,讲述中国的家国情怀与时代记忆。其中章子怡导演的《诗》以1969年中国研制长征一号火箭、发射首颗人造卫星为背景,表现在茫茫戈壁中一个普通的航天建设者家庭牺牲与传承的故事,航天人的形象不仅保留在卫星发射成功时的喝彩中,还奔波在面对失败的坚韧、随时牺牲的风险以及失去亲人的隐忍中。《诗》将航天精神的宏大叙事与航天家庭的个体经验交织在一起,在二代航天人的坚守与传承中,老一辈艰苦奋斗、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精神激励着当下的中国。

《长津湖》影片讲述了1950年朝鲜战争中,中国志愿军第九兵团在朝鲜长津湖地区,在极度严寒条件下与美军殊死拼搏、奋勇抵抗最终取得伟大胜利的感人故事。作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编剧和导演没有将叙事的重心放在彭德怀、毛岸英等著名的英雄人物身上,而是将目光集中在军营中的普通战士。电影在真实还原历史的前提下,虚构出伍家兄弟、雷公、梅里、余从戎等人物性格鲜明的七连战士,以普通志愿军的视角展开叙事。影片中对兄弟情、战友情的刻画将志愿军形象表现得饱满而立体,在行军途中种种生活细节的表现下,影片中的人物褪去了“战士”的光环,观众看到的不光是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战士,还是感情丰富的愿意舍家为国的“最可爱的人”。这让主旋律影片摆脱了厚重的历史感,赋予了电影更多的艺术和审美特征。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涌现一批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电影,比如《上甘岭》、《英雄儿女》等作品,至今仍被视为经典;七八十年代以来,抗美援朝题材的影片显著减少,同时其他现当代历史题材的影片也更热衷于表现近代以来中国的受难史,将抗日战争中的屈辱与苦难向人们展示出来,比如《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1942》等,在这种现代化的启蒙叙述下,中国近代以来是悲情的、遭受创伤的历史。直到近些年,《战狼》系列、《红海行动》、《长津湖》等一系列主流电影开始讲述新的中国故事,呈现新时代中国以自主的形态在国际冲突中成为负责任大国,这

是一种强大、自信、人道主义的新国家形象。这一历史叙事观点的转变,既是中国崛起以来文化自信的结果,也是未来应对更为激烈的全球竞争的时代要求。

平民英雄主义的彰显

除了上面几部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影片,还有几部电影改编自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案例,讲述时代背景下不同行业的奋斗故事,这些散落的故事碎片共同拼贴出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图景,不同背景的平民英雄汇聚起强大的中国力量。

《中国医生》按照时间的发生顺序全景展示了新冠肺炎疫情从暴发到得到有效控制中真实的武汉。影片通过丰富的细节将观众代入到疫情肆虐下的金银潭医院,影片通过特效镜头等方式对治疗过程进行了细致、科学的呈现,体现出医护人员和电影制作者在疾病面前的专业素质和人文关怀;同时,防护服和床位供不应求、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案、面临随时感染的风险,对于这些问题和困难的呈现,让大众能够客观地看待医生的工作,从而缓解当下日益紧张的医患矛盾。然而,在各种现实的压力下,无论是支援武汉的医护人员还是挺身而出的快递员金师傅,这些平凡的“逆行者”更加彰显了中国人民的集体主义精神。在政策制定、物资调度和医疗支援中可以看到疫情危机下国家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最后,随着方舱医院中轻松的歌声响起,武汉这座都市也在中国医生的守护下渐渐苏醒。

《守岛人》根据英模王继才和妻子王仕花的真实故事改编。从1986年开始,王继才和王仕花开启了在黄海前哨的开山岛长达32年的守岛生活,2014年王继才夫妇被评为全国“时代楷模”,2019年获得“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荣誉,同年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电影借助精心打造的视听空间还原了被台风和暴雨包围的海岛,让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海岛艰苦恶劣的环境。该片并没有塑造一个完美无缺的神化的英雄形象,而是真实地表现了王继才在岛上遭受的困难以及人物内心的摇摆,通过这种平民英雄主义叙事,来讲述新时代的英模人物故事。最终,通过“守岛就是守国”这一简单的道理凸显出“守岛人”王继才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以及深厚的爱国情怀。

还有电影《峰爆》和《铁道英雄》两部电影都将叙述视角聚焦到中国“铁道兵”。《铁道英雄》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临城枣庄英勇的“铁道游击队”与敌人斗智斗勇、捍卫家园的故事。《峰爆》则讲了一个面对突发地质灾害,新时代铁路建设者展开生死救援的故事。灾难电影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可以呼唤社会认同,塑造捍卫人类家园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借助灾难片既能反思现代社会的诸种危机,又能在人类的自救和他救中呈现人性的伟大,彰显对自然、对生命的敬畏之心。

无论是《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还是《峰爆》、《铁道英雄》,可以看出这些带有主流价值观的影片电影不仅越来越具备类型片的特征,希望通过强大的阵容、紧张的节奏、震撼的视听来赢得市场的认可,而且还逐渐跳出宏大叙事的框架,选择将镜头对准时代洪流中的芸芸众生,这种更加注重个体经验的叙事转向,体现出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价值观念的流变。通过对个人经验的书写,观众更容易产生共情,于是个人记忆再度与国家叙事交错重叠,电影作为大众文化产品,在观众产生的情感认同中其文化教育、社会治理的功能得以实现。

商业电影讲述中国故事

这一年,商业电影整体上虽表现并不突出但仍有亮点存在。各

种题材的类型电影丰富了国产电影市场。《你好,李焕英》、《关于我妈的一切》、《了不起的老爸》等讲述中国式家庭中的亲情故事;《盛夏未来》、《五个扑水的少年》表现青春的迷茫与梦想;同样根据小说改编的奇幻类型电影《刺杀小说家》和《侍神令》在中国风格的特效场景打造上做出了新的尝试;《怒火,重案》作为一部港式警匪动作类型片,格斗场面的精彩呈现让电影票房突破13亿,登上港片票房最高;《唐人街探案3》延续其前两部的IP价值取得高达45.23亿的票房成绩;根据张爱玲成名作改编的作品《第一炉香》上映前便备受关注,不过大胆的改编并没有获得观众的认可,尤其是主演的选择,因与原著形象不符成为不断发酵的“吐槽”点。

值得一提的是,贾玲导演的处女作《你好,李焕英》以超过50亿的票房成绩领跑春节档。贾玲用她擅长的喜剧形式讲述了一个关于妈妈的温情故事。故事发生在80年代的胜利化工厂,这种穿越的叙事打破了原本的时空关系,让传统的母女关系发生了改变。妈妈不再是以前银幕中那个年迈的、唠叨的、操心的传统女性,而变成了青春的、独立的、自由的年轻女性;母亲不再是长辈,而成为“我”身边朋友般的同龄人。这种视角的改变将观众引入关于妈妈的青春叙事中,重新思考妈妈作为个体的存在。最终,在双向奔赴的母女情的渲染下,“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情结尾更加容易引起观众的共情,“笑中带泪”成为影片最典型的特征。

相比之下,徐帆主演的《关于我妈的一切》没有突破传统中国式家庭的框架,操心的妈妈和叛逆的女儿构成成片最主要的冲突,在对抗癌症的过程中原本对立的母女关系逐渐走向和解。虽然人物的设定和故事的走向显得有些俗套,但是片中妈妈在与病症对抗中积极的态度依然打动了不少观众。

而另一部女性创作者主导的电影《我的姐姐》彰显出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张子枫饰演的女主人公安然成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一次意外的车祸造成了父母的缺席,姐姐便“理所当然”地承担起抚养弟弟的责任。电影尝试通过安然的外境揭示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观念中女性的生存困境,不过,虽然安然起初尝试反抗和逃离,但最终还是在自我和家庭中选择了回归后者。

11月份上映的《扬名立万》实现了喜剧片、悬疑片等多种类型的融合,借助“剧本杀”这种当下流行的叙事形式,故事层层展开,这种“剧本杀”结构的特点在于节奏紧凑、高潮迭起,频繁出现的反转突破了观众的预期,再加上演员表演营造出的喜剧效果,满足了娱乐票房需求,也让电影获得了良好的票房和口碑。

今年还有两部纪录片值得关注,分别是贾樟柯导演的《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和徐蓓执导的《九零后》。前者讲述了导演与马烽、贾平凹、余华、梁鸿四代作家的对话,通过跟随作家实地探访,回望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乡村社会的变迁。后者通过杨振宁、许渊冲等16位学者的回忆,再现了西南联大的昔日风华,借助文学家、科学家的人生感悟共同书写百年中国的历史沧桑和多样的文化图景。

2021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中国电影坚持初心不变,创作出一系列兼具历史内涵与现实意义的优秀作品,镜头内外是山川巨变的中国社会以及发生在每个中国人身上的时代故事,彰显了全球文化博弈中愈加坚定的中国精神和中国自信。

(宋宇昊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张慧瑜系北京市文联2021年度签约评论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

中国电影如何讲好苏区故事

■文余克东

11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90周年座谈会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原中央苏区考察调研、缅怀革命先烈,强调要大力弘扬苏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不能忘记革命理想和革命宗旨。电影作为文化传播最普遍、最便捷的方式之一,近年来涌现了《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等诸多“新主流”佳作,在传承红色文化、讴歌革命精神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关于苏区题材电影的创作如《浴血广昌》、《信仰者》、《八子》、《古田军号》、《半条棉被》、《三湾改编》等却“叫好不叫座”,与“十七年”时期以苏区为主题创作的《翠岗红旗》、《红色娘子军》、《闪闪的红星》等经典作品相比相距甚远。站在新时代的新起点上,中国电影如何讲好苏区故事,弘扬苏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紧扣苏区精神

紧扣“苏区精神”是中国电影讲好苏区故事的基础与前提。2011年11月举行的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首次明确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为内涵的苏区精神。2021年11月2日,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90周年座谈会上,更是强调了“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本色和精神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苏区许多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都是苏区精神的生动诠释”。要想讲好中央苏区许多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就应该紧紧围绕苏区精神的内涵,从历史与当下两个维度进行开掘。

近年来苏区题材的电影如《古田军号》、《八子》较为集中于围绕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的斗争描写,包括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而往往忽视了在苏区建设时期共产党执政时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等更为具体的表现。比如说求真务实方面,毛泽东同志在苏区开展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提倡反对本本主义,强调实事求是,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打了坚实的基础。在贪食反腐方面,如苏区严惩第一贪官谢步升的故事,不失为一个很好反映苏区精神中“清正廉洁”的切入口。此外,中国电影苏区故事的表达还可以集中在新时代下苏区(革命老区)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发展、新面貌,充分展现新时期以来苏区新农村建设与脱贫攻坚成果,尤其是新时代下那些默默奉献在苏区乡村振兴一线的党员同志们,而不只是停留在历史、战争与政治说术中。

创新叙事角度

紧扣“苏区精神”是讲好苏区故事的基础,创新叙事角度则是关键。苏区题材电影应该跳出战争渲染、直白说教、强硬抒情的窠臼,让电影回归“十七年”电影时期“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寻找新的叙事角度和故事体裁,创作出能打动观众而又情感充沛的电影。例如反映“军民鱼水情”的夜渡于都河的故事就非常感人。红军开始长征时,于都人民每到傍晚时分就自发地将自家的门板、床板乃至棺材板拆下来到于都河搭桥,帮助红军顺利渡河,等天一亮,又将浮桥拆除,将行军脚印抹掉,使其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当时30万于都群众对此守口如瓶,严守这一个“天大的秘密”,保证

了红军顺利从八个渡口通宵达旦渡过于都河,安全成功的路上长征第一步。在这几天,于都的夜晚总是此起彼伏的传来木槌在大石头上捶打稻草的声音,勤劳的苏区人民夜以继日赶制了20多万草鞋送给红军,在红军离别时,本就不富裕的苏区人民拿出自家的红薯、鸡蛋等粮食塞给即将远行的红军战士们,周恩来同志为此发出“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真亲”的感慨,这期间很多故事真挚感人,很好反映出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

此外,从小人物或者从群众的角度来表达人类一般性情感往往更能打动观众。如在得知即将开始长征时,由于战争的残酷性和长途跋涉带来的不确定性,很多苏区的领导干部不得不忍受骨肉分离之痛,将自己年幼的子女托放在苏区老老家就地安置,其中就包括毛泽东、林伯渠、邓子恢、陆定一、邵式平等领导干部。待新中国成立以后,领导干部们纷纷来到中央苏区寻找昔日丢失的孩子,期间有错认、误认乃至牺牲的情况,涌现了很多富有戏剧性而感人的别样寻亲故事,何尝不是一个富有新意的角度。还有关于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秘密交通线的故事以及苏区妇女解放活动、苏区文化建设活动等,都是很好的叙事角度。创作者需要向历史、群众、生活要素材,从新的角度去讲述苏区真实的故事。

探索多元类型

讲好苏区故事重点还在于注重多元类型的探索,尝试更多苏区故事表达的类型和方式。关于苏区的历史与故事较大幅度上集中在剧情片上,至今未见有一部完整的关于苏区故事的纪录片,也缺乏苏区题材的动画电影,不得不说是个遗憾。

在剧情片上,除常规的战争片、传记片外,还可以尝试谍战片类型。如在第五次反“围剿”之际,中央红军能够及时转移开始长征,得益于第一时间获悉蒋介石150万军队合围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而这个情报来自于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和潜藏于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莫雄是一个国民党进步人士,此前曾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担任江西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和第四区保安司令期间,积极联系中共地下党员传递情报,成为党组织安插在国民党剿共前线的重要人物。在庐山会议中得知“铁桶计划”后,莫雄迅速将消息告诉了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任机要秘书刘亚佛、卢志英等,随后项与年将情报隐匿于字典中,从南昌跋山涉水前往中央苏区。为掩人耳目顺利过关,项与年不惜砸断自己的牙齿,以乞丐的装扮顺利抵达瑞金,成功将情报传递到了中央苏区,使得中央红军得以顺利长征,免于全军覆没的危险。此外,苏区还涌现了许多感人的爱情故事,如在兴国县被誉为“共和国第一军嫂”的池煜华,为了一句承诺等待红军丈夫70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为苏区题材电影的新类型探索提供了可能。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早期实践的苏区,集中体现着青春、汗水与智慧的闪光,在党史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讲好苏区故事,传承苏区精神,中国电影不能因循守旧,应该以苏区精神为基础,创新叙事角度,注重多元类型探索,创作出具有温度的、真实的、情感充沛而又符合当下观众口味的电影作品,如此才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通过银幕传播党史的好方式。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